



戏里戏外

陈亮

一场舞台剧,三尺讲台,台上青、老二代检察官各司其职,演一出民法典宣传剧。

在5月26日院里演出的这出舞台剧里,扮演母亲角色的是25岁的李萧璐。剧中,她饰演的角色是居住权受到侵害的后母。为扮演好这个角色,她温习了电视剧《我的丑娘》里母亲翠菊的角色,大学时她看这部电视剧,一边看一边哭一边骂王大春的视频。这个剧她久久不忘,如今轮到她上台表演了,她希望能也达到这个效果,让台下的观众同情她或者是憎恶她的软弱,这样子民法典的宣传剧才是成功的。

演绎的剧情由曾经办理过的案子改编:父亲去世时留下遗嘱,房子由儿子继承,但儿子必须保证让后母在该房屋中住到闭眼那天,儿子信誓旦旦地答应了。不久,儿子娶亲,两代人的生活观念发生剧烈冲突。从骂猫打狗开始,直到发展成婆媳之间的直接冲突。

舞台剧的高潮部分有一句台词:“房本可没您名字,法律认的是产权证,不是死人的话。”讨论剧情时,参演的检察官说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让儿子说这句台词,有人主张让儿媳说。

支持儿子说这句台词的检察官认为,所有家庭矛盾的初生,总有一位拎不清的家庭成员,剧中儿子就是这个角色。按照归责原则,由儿子讲这句台词正合适。支持儿媳说这句台词的则认为,不管归责原则如何,家庭矛盾的本质是观念的冲突,冲突中因为隔着亲情和伦理的关系,总有一方要在家庭矛盾冲突中饰演恶人,儿媳扮演了恶人。为贴合角色,台词就该儿媳说。

争论的话题便渐渐延伸至家暴起源的讨论,这样的争论让还是检察新人的李萧璐觉得很有意义。因此在角色和台词定下来后,她用力揣摩角色,希望可以演得真实。真实才有力量,真实才能带来讨论。

距民法典颁布已经过了五年,各地都在创新民法典的宣传模式,创新的原因几乎都一个样——传统的宣传效果不好。要把民法典里的内容化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于无声处浸润听众的心。

演出当天,当婆媳冲突爆发后,看剧的老年观众心有戚戚焉,两名老人的交谈声传递了检察官耳朵里。

“我儿媳已经有意无意地骂狗,这不是个好兆头。”

“这就是养猫养狗的好处,看吧,你都发现了预兆。”

演出结束后,两位老人等着和检察官说话,让检察官再给她们讲普法。检察官引导老人到“法律门诊服务台”前,开展一对一普法。

检察官先念了法条“居住权有权依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然后又转化了语言,“得设立一份合同,合同里得写明白让您居住。”

这一次演出效果是前所未有的,不是演出结束人就散了,是看演出的人等检察官普法,所有参演的人都很受鼓舞。

演出结束后,检察官问观众们对舞台剧的看法,回答最多的答案是:“这个剧看得进去。”

复盘时,“看得进去”这一点便加入了部门法治宣传的工作要求中。

在李萧璐看来,好的舞台剧必须用细节说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剧情设计没有一开始就刻意制造冲突点,从儿媳挑拨“后妈”开始讲起故事,老柜子其实是后妈观念的体现。儿媳觉得老柜子丑,而老柜子对后妈来说,却承载了往日的记忆。

两代人的观念冲突该如何处理,剧中的后母未来又该如何生活?产生裂缝的亲情该如何修复呢?检察官不知道。

不知道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故事的结尾,检察官问观众:“如果您是这个母亲,以后该如何在这套房子里生活?”看剧的人三五成群地讨论起来,气氛热烈。

“如果我们的剧能真正帮到一个人,我觉得就是莫大的幸运。做到了这一点,民法典的宣传才是真正走入了人们心里。”李萧璐说。

“我们知道民法典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可是好东好西老百姓一定会爱会用吗?这个问题应该每一位法治宣传者都自问一次,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如果觉得自己宣传没能把好东西传递到老百姓的内心,那就向党的光荣传统取经,学学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好方法。”演出结束后,已经58岁的罗忠兰检察官向年轻检察干警传授她对宣传的体会。

罗忠兰年轻时,领导向她讲党的好作风、好方法时,曾说过一首江西兴国山歌,她听了一遍就记下了。她背给年轻的检察官听:“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农工。”当年她的老领导解释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就隐藏在这首歌中,“自带干粮、着草鞋、夜走山路”,到老百姓家里后讲的一定是老百姓的话。

舞台剧的名字叫《遗嘱的余温》,意思双关,民法典保障老人的居住权,这是司法的温度。传输的手段也要“温”,不是冷冰冰地让你接受,而是把宣传转化进故事里,让每一个观众一边看一边说一边问一边讨论。

(作者单位: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的。我的指尖虚抚过墙面,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刚刚走访过的隔壁镇一个清代寺庙——用丙稀颜料“修复”清晚期壁画。庙祝还对几年前香客们集资对寺庙进行翻新感到颇为自豪。

忽然,一束阳光穿过窗棂,正好落在壁画中一条飞扬天起的飘带上。历经劫难的金箔在光线中突然苏醒,绽放出惊人的光彩。这一刻,我更加坚定了守护的信念:我们办理的每一件文物保护案件,都是在为文明续命;发出的每一份检察建议,都是在为历史发声;开展的每一次普法宣传活动,都是在播撒文明的种子。

走出大殿,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面残壁。在昏暗的光线中,那些斑驳的色彩依然倔强地存在着,就像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后院的石刻倒是保护得不错。记得小时候常和小伙伴在这里玩耍,把刻着字的石碑当迷官钻。如今这些石碑被玻璃罩精心保护着,我蹲下身,辨认着儿时看不懂的刻字。“这是嘉靖年间的功德碑”,同行的检察官助理小左指着碑文,“记载着当年重修寺庙的善信名单。”阳光透过老柏树的枝叶,在碑面上洒下跳动的光斑,那些深深的刻痕忽然鲜活起来。

离开时,春日阳光正当空,为云盖寺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老张锁门的声音惊起檐角的风铃,叮叮咚咚像在诉说往事。暖阳中的云盖寺安静得像幅画卷。我知道,在我们的守护下,这幅画会一直流传下去。就像老张说的:“好东西要慢慢看,仔细护,日子还长着呢。”

(作者单位: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检察院)

时期,不过他最大的收获,是潜下心来看了很多的书。他说:“我知道必须充电了,这个职业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都学不完。”

2000年,他迎来一次大考:那是全市统一考试,西城区检察院第一批考上6人,梅松是其中一个——他被任命为主诉检察官,此后回到公诉岗位。这一次,他为自己的公诉生涯又增加了12年。

这也就理解了此后进行的司法改革中的检察官员额考试,梅松虽然已算“高龄”,依然没有放弃……

4. “我送卷宗的车怎么没了?”那天我到西城区检察院闲逛,梅松正满处找他的手推车。他的手推车上系一根红绳子,免得跟别的手推车混淆,好认。

那时的梅松在案件管理部门工作,“主要盯流程,盯程序”。手推车把卷宗送过来,他一摞一摞审查,然后再推车送走。每天走廊里他推着车的身影,算是独属于他个人的风景。经历唇枪舌剑、暗流涌动之后的他,淡定让我觉得有点无聊。

喧嚣之后归于平静,那种法庭上的火热似乎已隔世。

我还记得黄廷山、谢虎这起“全国检察机关优秀诉讼监督精品案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释放谢虎的那天,谢虎固执地要求与梅松合影……

一位年轻姑娘在一家酒店工作,负责管理厨房每天外购肉菜所需钱款账目的进出。有一天,餐馆老板竟然让她陪酒,她断然拒绝,老板停发了她的工资。姑娘忍无可忍,卷走手头钱跑了……

梅松发现,涉案原始票据上有明显涂改痕迹,本该是阿拉伯数字的“1447元”,首位的“1”添加笔画改成“4”;同样,还有将票据数字上的“3”改成“5”等等。餐馆老板串通财会及餐馆人员篡改报复那名作逆他的意愿又卷款出走的姑娘,伪造数据,报案称失窃钱逾万元……

事隔多年,已经退休的梅松对此依然难以释怀。

曾经有人问梅松,检察官是做什么的,他的回答总是:“让有罪的人进去,让没罪的出来。”梅松立功多次,立功受奖大多因案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而来,一般人反而忽视梅松最为看重的无罪之诉——以不起诉结案的案子。其实,梅松作为公诉人办的最后一案,最终也是以无罪不起诉结案。

在梅松的抽屉里发现一张张的剪贴纸,每张都密密麻麻。“那是当初准备入额考试用的。”他得意地一展示,“那段时间把考点都拿出来看。年龄大了记性不好,所以看一两遍不管用。”

长期的高负荷,身体承受的压力及后果超出了他的预料。在一次首都媒体对执法者健康状况的调查中,梅松“有幸”作为样本——高压160。这是梅松生平第一次量血压,他没有想到,自此以后就被戴上了“高血压患者”的帽子。

2014年,梅松诊断出脑梗。但2017年,在前一次入额考试失利之后,他第二次考试以第三名的成绩入额。梅松从来没有过行政职务和级别,他说:“我做了三十年检察官,我不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失去它!”

重回云盖寺

柯娟



云盖寺一隅

祥云、瑞兽,如今都被一道丑陋的锯痕拦腰截断。我的指尖触碰到那些伤痕,仿佛能听见文物无声的哭泣。

角落里,一块黑漆斑驳的匾额斜靠在墙边,上面“大雄宝殿”四个字中的“大”字被描了金,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突兀。老张苦笑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乡里觉得匾额太旧,要修旧如新,但是刚描完第一个字,省文物局的专家正好来考察,当场就叫停了。”

我蹲下身,仔细端详这块劫后余生的匾额。未被描金的三个字虽然黯淡,却透着岁月的温润。而被重描的

司为洪添置一辆介于大众捷达和奥迪之间的尼桑蓝鸟轿车。

“购车款是以公司名义从制药公司的财务账上支出的,该事实有公司销售经理、法定代表人、会计的证言,该公司财务说明、支出证明、存款日记账、转账支票存根、汽车购置证明、购车发票等为证。”二审开庭,梅松将桌上的卷宗轻轻一拍,“购车不是私人馈赠,而是公司行为,目的是什么,这还看不出来?”

法庭当庭判决,判处洪有期徒刑十年。听到判决的洪骤然失控,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疯一般在法庭上大喊:“我是被药厂陷害的!我是被他们陷害的!”

我朝公诉人席上的梅松看去,他朝我翻了个大大白眼。我恶趣味地想,按他的调皮秉性,会不会心里在想:哼,小子,跟我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逛到西城区检察院听故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梅松,那时候西城区检察院在距离西单不远的二龙路,与法院合用一座破楼。那个故事说的是检察官在办公室提审一名犯罪嫌疑人,结果犯罪嫌疑人趁一名检察官转身给他倒水,跳起来撞开窗户跳出去,另一名检察官手疾眼快,一把薅过去却只扯下了嫌疑人的大衣。金蝉脱壳的嫌疑人跳出窗外,然后狂奔……

多年之后我与梅松闲聊起这个故事,梅松乐了。

“哈哈,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案子了!你知道那个逃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吗?不知道吧?隔壁就是公安分局,这家伙直接就奔公安分局去了……”那天梅松正好也在提审,听到有人叫嚷和吵闹声。

我认识梅松的时候西城区检察院已经搬到了平安里西大街的官园附近。最早的北京官园是花鸟鱼虫市场,西城区检察院搬过来的时候,官园已不复当年的模样。世事变迁,后来西城与宣武两区合并,西城区检察院也已搬到现在的新街口西里。然后是人额、转隶,经历了这些变化的梅松这样的“老人们”,注定了次次地磨炼着自己,直到最后如透彻世事与人生的老僧人般坦然、淡定。

梅松第一次出庭是1986年3月,以助理检察官身份出庭支持公诉。“我们院的朱丽陪我去的,我们选了一起盗窃案,这是我第一次动手,别人也许没听说过,但是我自己的声音颤抖,会出现停顿、重复。”他紧张得生拍出一点头汗,嗓子冒烟,小腿哆嗦。出庭两三次以后,他不再紧张了。

至今梅松依然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到刑场监督,目睹罪大恶极的罪犯被一枪毙命的场景。他也会提到凶杀案现场那些残酷的场面。他说:“如果事后真的有人中午请你吃汤粉、肉饼,你还真的就吃不下,哪怕到现在,你也抹不掉那些场景。经历这些事多了,你就通透了。”

7年的公诉生涯之后,他又在批捕部门工作5年。1995年,孩子就要出生之际,他申请到政治处工作了5年。给院里出黑板报出海报就是在这个

会体会到:文物保护从来不只是守护砖石土木,更是守护一代代人的精神家园。

右厢房里陈列的早船、渔鼓让我驻足良久。牛皮鼓面上细密的裂纹像是岁月绘就的山水,黄铜锣镲把手处透亮的包浆记录着无数双手的温度。这些精致的民间艺术瑰宝让我想起了办案时接触过的非遗传承人——正是他们,让这些藏品有了魂。

大雄宝殿依然巍峨地矗立在院落中央,但那扇崭新的朱漆大门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红光,与古寺沧桑的基调格格不入。我的手指抚过门板上机械雕刻的纹路,不禁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古老门扇——那是用传统榫卯工艺拼接而成,每一道纹路都沉淀着匠人的体温与时光的印记。

文保员老张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叹了口气道:“跟我来。”他带着我们绕到后院一间低矮的库房,掏出钥匙时,那串钥匙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年的木香混合着霉味扑面而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几块布满银痕的木板静静地靠在墙边,像一群被遗忘的老兵。

“这就是原来的殿门,”老张的声音有些发颤,“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改作政府办公用房时,干部们缺床板,就……”他的话没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那些被锯断的门板上,还能清晰看到精美的浮雕纹样——莲花、



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

在陕西省镇安县以西20公里的云盖寺镇,有一座古寺,它坐落在秦岭南北交界之地,自古便是连接关中与巴蜀的交通要塞,这便是“有名堂的云盖寺”,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赐名,我的老家就在这里。

儿时的记忆里,我常与伙伴们在镇上的老街上闲逛,无数次穿过那座曾经香火鼎盛的云盖寺。老人们讲述着这座古寺的往事,它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因常年云雾缭绕,形似“云覆其上,若盖然”。

今年3月的一个清晨,我又一次推开了云盖寺斑驳的木门。这一次,我是作为院里“巾帼护文韵·检察绽芳华”主题活动日活动的参与者,与一群女干警踏入这座承载着太多记忆的古寺。春日的阳光斜斜地穿过门廊,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童年的自己正蹦蹦跳跳穿过这座院落。

如今的云盖寺已不再是儿时记忆中那个热闹的场所。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锁着门,只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才敞开怀抱接纳虔诚的香客。文保员老张掏出那串古铜色的钥匙时,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在寂静的庭院里格外清晰,像是开启时光之门的咒语。

左厢房的村史馆里,一件件老物件安静地诉说着往昔。我的指尖轻轻抚过那个泛黄的妆奁,漆面早已斑驳,但牡丹缠枝的纹样依然精致如初。恍惚间,似乎看见某位新娘娘对镜梳妆时羞赧的笑靥。旁边的蓑衣上还沾着河畔的潮气,让人想起洗衣女子在细雨中的身影。那一排排物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活生生的情感载体,它们让我深切

梅松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最醒目的是一张四人合影老照片。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梅松入职的第二天,领到第一套检察制服,梅松和三个小伙伴意气风发,一起到西单的国泰照相馆合影。国泰照相馆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照相馆之一,那时候拍这样一张照片算是比较奢侈的消费了。这张青春年少的照片,那身恍若隔世的制服,让如今的观者有了许多的沧桑感。

与梅松认识二十余年,不知道他到检察院之前是做什么的,一直以为他是学院派的法律人。“不是,就一临时工。”梅松答。

1. 9月28日,看守所。梅松这天在看守所提审一起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黄一山,调查一件昂贵的证物——一尊钧瓷滴水观音的去向。作为这起案件的公诉人,他需要这个影响案件性质的证物细节。讯问结束之际,梅松发现黄一山欲言又止的样子。梅松是典型的北京人性格,豪爽、直率、外向,大大咧咧。但平时似乎有点大大咧咧的梅松其实心思缜密,他的直觉和观察力让他不止一次发现案中案、案外案的端倪。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放过。

“你是还有话要说吗?别憋着,会憋坏的。”梅松眼底掠过一丝笑意。

“我……我要是说出来,你要是不管,那我就惨了……”

“你放心,如果跟案子有关,我们会严格保密……”有人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与被告讯者建立起一种信任,梅松就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诀窍,其实这是一种责任驱使的磨刀功夫——跟不同的案子磨,跟不同的人磨。

接触各种类型的嫌疑人,在犯罪人的世界行走,对每一个犯罪细节保持警觉并条分缕析,有人凭借洞若观火的眼力,有人凭借不怕麻烦、不怕旁生枝节,梅松至少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

“进检察院之前,我就是一个待业青年。”梅松小时候太调皮了,下河钓鱼、上树抓鸟,整天就是淘,就是不好好学习,每天玩到一起的都是调皮孩子,“等我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在足球队踢过球,在田径队天天训练——他说:“除了体育,我没擅长的。”父母双双下放,没人管的调皮孩子只是本能地一级级混到了高中毕业。1979年第一次高考失利,梅松无奈之下,到父亲所在的出版社做了一名临时工,这至少可以让他有口饭吃。

其实直到今天,梅松依然爱玩,旅游、拍照、尝遍各种美食——尤其是喜欢每到一地就蹲在大排档大快朵颐,过足嘴瘾。但就从毕业的那个时候起,那个只知道抓鸟逮鱼的调皮孩子即将开始换胎换骨……

那天在看守所,黄一山提供的看守所中发生的索贿案件线索,让梅松心头一震:这就像一出戏剧,时间、人物、地点俱全,不可能让人一笑置之。

然而,讯问结束时,对方却拒绝在讯问笔录上签字——他后悔了。“他被羁押着,检举羁押他的那个人,如果遭到打击报复怎么办?这是最正常不过的心态……”

梅松不得不再一次苦口婆心。认识梅松二十年,一直知道他是个急性子、嘎巴脸的人,但我后来知道,其实

入职之后的梅松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1985年,入北京市法律夜大,四年间,白天上班,每天晚上5点到8点上课。他同时报了英语大专,后来增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函授本科……

刚到检察院,作为书记,梅松跟着检察官“师傅”安丽云办理特大强奸伤害案件,那些犯罪细节让初入门廊的年轻人听得面红耳赤;刚开始接触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监狱的犯人,那些阴鸷的眼神让他不敢面对,心里发紧。多年过去,他也带了很多徒弟。恶性刑事案件那些血腥的照片,他用曲别针别上,一帧一帧地看,让徒弟也看。他说:“一般的案子你也许不用看,但是大案疑案你必须看。你是公诉人,法庭上律师跟你较着劲儿呢,两边打